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思想精髓及其时代价值

尹才祥^{*}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创立了系统、科学的分工理论,不仅科学地阐释了社会分工的科学内涵,还深刻揭示了社会分工的本质特征,认为社会分工作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内在的不平等性、地理上的不均衡性以及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的不平等现状及深层原因,也为我们分析、把握和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因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社会公平

“社会分工”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创立了系统、科学的社会分工理论。随着列宁、卢森堡等对分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①等的深入系统研究,在揭示分工自我扬弃的辩证发展逻辑中把握和勘定资本主义分工的深层原因,使分工理论得以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同时,这一理论本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也不断得到体现和彰显。重温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化态势下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对世界各国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为全面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因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平等分工提供有益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分工内涵的科学阐释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相互作用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分工理论从根本上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的职能固定是强制的和不可自由选择的,这种以个人的片面发展换得社会发展的分工必将限制或牺牲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分工理论置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

^{*}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210044;本文是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空间正义与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2015M57043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空间正义研究”(15MLB009)阶段性成果。

^①多琳·马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空间问题研究专家,《劳动的空间分工》是其成名作。

社会再生产之中展开,在对传统分工理论批判、扬弃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古典经济学以增长为核心的分工理论有着本质区别的系统、科学的分工理论。

首先,对分工原因和本质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对分工原因和本质的科学认识建立在对斯密分工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之上。斯密分工理论通过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关系展开,其理论核心是:交换引起社会分工,分工的精细化程度受到交换能力、交换范围和市场的限制;分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马克思看来,包括斯密在内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局部问题上的确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但对分工的社会根源、认识根源、研究方法以及分工的本质却没有给出科学的回答。马克思正是在继承斯密及以往分工理论基础上,实现对斯密分工理论的丰富、发展和超越。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需要;交换只是使分工作为现实呈现出来,而作为生产活动表现形式的是分工而不是交换,分工既能够揭示生产活动的秘密又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揭示分工的原因和本质。而分工在斯密那里主要是一种“自然”进程,他没有把分工理解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特殊形式。马克思虽然也认为分工产生于纯生理基础上的自然分工,但他同时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变化也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就生产力方面而言,分工的细化使生产力诸要素打破原有的方式重新组合;这种组合不仅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也标志着新的生产形式的诞生。“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①,“分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②。就生产关系而言,分工的每一次扩大与细化都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形成新的分配,“分工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③,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活动的交换;这种活动的交换不仅改变了原有生产活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不仅具有平等交换意义上的“物”的意义,重要的是形成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从属的新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经济关系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物”的关系以外的政治关系的形成。马克思从不主张从分工一般来讨论经济发展和演变,而是更加注重分工在具体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现状,因为分工不仅体现生产力的性质,还体现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马克思一直反对将社会分工的概念抽象化和永恒化。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联系,是生产关系中最靠近生产力的层次。他还运用分工理论论证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精彩运用和发展。

其次,对分工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理论的论述从来都是建立在生产、市场和社会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分工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原因,市场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分工的广度和精细化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指出分工的精细化程度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这也恰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列宁对分工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是建立在对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理论以及斯密分工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他联系俄国实际,在其著作《论所谓市场问题》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用分工理论论证商品经济的产生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过程。他还对以尼·一逊为代表的民粹派经济学家进行批判。尼·一逊否定“分工—市场—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发展逻辑。列宁着眼于世界资本主义分工市场,认为没有分工就没有市场,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而市场是商品经济形成的重要条件,“即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国内市场的关键就在于社会分工的扩大与细化。列宁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329页。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2页。

④《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85页。

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①

在列宁看来,不同专业的分离是分工的结果和潜在要求,而类似甚至相同专业的汇聚形成市场,包括国内市场 and 国外市场。市场发展的限度取决于分工的专业化程度,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俄国民粹派理论家把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明显夸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为因素的主观作用,这一方面说明了民粹派经济理论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斯密分工理论的误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在远离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次,对分工与资本主义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揭示。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理论基础之上对斯密定理作了发挥,论述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过程。在列宁看来,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就是社会分工,因为社会分工改变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直接关系,即实现了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对此,马克思则认为由于生产者本身并不拥有生产资料,是因为“生产权利”的支配权并不从属于直接生产者,从而导致“人”与“物”的分离。列宁认为这种分离使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原来简单商品生产也逐渐走向衰落。分工的加剧与扩大使这种分离成为“普遍”,资本主义国内外市场也逐渐得以建立与扩大,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②列宁的结论是,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社会分工的细化与资本主义市场扩大的必然结果。他的此番论述主要立足于俄国经济发展现状,意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指导俄国的经济发展。他的资本主义“国内外市场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分工理论,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对分工本质特征的深刻揭示

分工是我们解开历史发展和进步之谜的重要入口。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决定了分工理论自身的本质特性,科学认识并深刻把握这些本质特性对我们深入理解分工理论的思想精髓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一,历史的继承性。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发现,分工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分工发展与人类历史变迁密切相关,科学认识分工理论的本质特征,不仅要重视分工的技术维度更要把握好分工的历史维度。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内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社会内部分工,进而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技术关联。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群体化生产实践的劳动技术组合方式,以何种方式组合与生产工具有关,这就说明分工的细化、扩大与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就分工的社会意义而言,分工受制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因而具有身份和地位的差别,在此意义上,分工就意味着不平等的存在,消灭分工就等同于消灭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不局限于分工的内在技术逻辑,而是把分工置入历史领域,探讨分工的历史规律及历史作用机制。“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第718页。

^②《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61页。

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①“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②,马恩通过对分工的历史性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分工是分工历史演化的结果。资本的无限增值必然带来分工的不断调整,在历史地扬弃旧式分工的过程中,加速实现分工的历史转变。在此意义上,每一次旧的社会分工都为新的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每一次新的社会分工都是建立在旧分工的基础之上,是在生产力和社会实践维度上的历史延伸。

其二、内在的不平等性。斯密强调分工对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但他却忽视了分工中的社会等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分工,他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作为生产关系主体的经济关系,“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③。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通过批判柏拉图“分工即正义”的判断,表明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工,同时分工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柏拉图认为,分工仅意味着合适的人从事最适当的工作,分工与正义和是否平等无关,因此分工仅仅是“技术性”的需要,与“社会性”无关。马克思认为柏拉图没有考虑到分工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以及分工本身可能导致的不正当。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实践的结果,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他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大的视野中去考察,指出分工不仅是结果,还可能是产生并延续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因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无疑在分工中也会占据优势,并把这种经济结构中的优势延伸到其他领域,进而形成社会的分层和固化。可以说分工既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原因,同时社会分工也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在生产领域内造成的结果,这种不平等分工的结果进一步巩固并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况且,“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地,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类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④。不难看出,马克思与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平等的分工才意味着正义”,而分工本身并不意味着正义和平等。

其三,地理上的不均衡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结果,但从全球角度来看,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成果并没有均衡地惠及全球经济发展。原因就在于,生产力发展本身的不均衡性导致分工领域和分工精细化程度的不均衡。就总体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并没有把这种分工的不均衡性延伸到地理空间中去,也没有有效呈现地理本身的不均衡发展对分工的影响。在这方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多琳·马西以其独特的空间视角打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在“空间问题”上的长期保守和沉默,从“劳动的空间分工”视角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发展,进而揭示空间分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劳动的分工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社会分工、技术分工、性别分工等)。而马西认为,传统的“分工”一直被视为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忽略了分工的地理空间内涵,事实上,空间逐渐成为许多大公司在生产组织和经济增长中寻求最佳投资区域的重要变量,导致经济空间格局在地方和全球各个维度上产生变动。可以看出,“劳动的空间分工”在“生产”和“经济”领域影响生产空间布局 and 空间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形塑了不平衡发展的地理空间,也为再生产出新的不平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因此,劳动空间分工已经成为社会分工理论历史演进的高级阶段。马西以“空间分工”视角看待生产环节地理分工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的结构分析和空间的社会内涵,构架起了“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重组和变迁——阶级冲突与不平等——空间分布非均衡发展——产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82,124,37页。

业结构”^①的劳动力空间分工分析框架,形成了一种空间视域下的经济学问题研究路径。这使“劳动的空间分工”理论得以进一步完善,同时说明了空间位置对资本积累和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资本主义企业利用劳动力的空间差异来实施战略调整,根据对劳动数量、质量和价格的综合权衡减少或放弃某个地方的技术工人,而代之以其他地方的非熟练性工人。马西认为,劳动力变得具有地方性(地区性)和专业性特点的现象标志着劳动力新的空间分工的形成。因而,马西对“劳动的空间分工”并不仅仅进行经济解释,她还探讨了特殊地理位置、社会特点对分工的影响,强调地方性“工作文化”对新企业位置选择的重要意义。“劳动的空间分工”还“聚焦在传统上称为‘经济的’事物上面,它是关于产业区位、职业和社会结构的地理学。对产业和生产的研究,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本身就是在更广大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领域中建构的”。^②她还通过对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研究,阐述了不平衡发展的观点,以及这些因素对更广大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的重要性。劳动力在空间上进行分配的同时,等级关系的分配也在同时进行,这在客观上为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马西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分工”现状,揭示了社会分工在资本逻辑中的决定性意义,尤为可贵的是,她把分工置入全球化背景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考察“空间分工”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及其不平等的再生产,为世界反资本主义斗争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其四,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分工中看到了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这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巨大超越。马克思以分工演变为视角和主要线索,探索个人生成、发展和寻求自由的可能性,在历史的不断生成展开中探寻到了真正实现个人解放的现实道路。“人不是在某种规定性上在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③在马克思看来,个人解放从来都不是某种抽象的价值预设,而是随着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分工结构的演变,逐步探寻和明确自身解放应有的必然指向。私有制的出现,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化,同时也形塑了日益独立的个人。在资本主义分工结构下,分工还是实现资本增值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工厂手工业分工……,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成为限制工人全面发展的手段。”^④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分工必然不断发展和演化,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也逐步建立并得到不断强化,个人解放也就愈益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现实命题。分工的历史演变不仅成为个人解放的必然要求和必然指向,同时为个人解放提供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有的以消灭私有制为根本目标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只是实现个人解放的前提条件,真正的个人解放应是个人自身的、对自我内在价值和内在创造力进行不断地挖掘与探索,尝试和探索自由联合的新的分工形式,从而为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现实可能性。

三、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时代价值

从根本上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内涵、本质及特征的科学认识 and 对其所内蕴的分工辩证发展逻辑的深刻把握,就无法厘清发达资本主义现实发展与通过不平等分工对国内外进行剥削的运作机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穿透资本统治全球的意识形态迷雾,从而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真正探索出个人解放的现实道路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平等分工。

①袁久红:《劳动的空间分工:政治、权力与地方》,《哲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②[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梁光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第480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第一,全面认识和理解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内涵及特征。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始终认为分工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分工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价值转移的根本原因。当前,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各主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却因经济、技术实力悬殊和规则与标准制定权被垄断而存在天壤之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全球政治霸权逻辑和资本强权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通过国际分工已延伸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分工体系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边缘国家的剥削,由于各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致使资源和财富向发达国家倾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大企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设工厂,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在法律上对工人和环境保护的漏洞,直接将超额利润转移到发达国家;二是国际大企业利用世界经济体系等级结构所产生的世界贸易中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将边缘国家产品中的大部分剩余价值以隐蔽的形式从边缘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这就直接导致参与主体从国际分工中获益不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现状,一方面只有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限制甚至消除存在于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特权和霸权;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应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参与传统国际分工并适应新的国际分工,顺应全球分工发展态势,以自主创新为主培育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领位势高的地位,因为这是关乎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二,科学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分工的新特点、形态和运行机制。当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分工也逐渐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这对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个人天赋是教育和社会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社会分工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不平等。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因分工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已成为突出问题。当然,分工所导致的这种不平等并非仅仅因为纯粹的分工使然,还与我们对分工的传统认识以及阶层固化、制度层面导致的城乡差别等因素有关。比如因为分工导致的不同职业在社会中相对重要性不同,所以不同职业所得到的报酬和社会声誉就不同,这也表明不能仅仅把社会分工看作一种“技术性”的需要和结果,从而忽视了分工本身可能积累的差异和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等级固化的风险。既然分工是实践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就不能因为分工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而排斥社会分工,但同时还要防止人为的不平等分工的形成以及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

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分工的特点、形态和机制并解决分工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不仅事关我国经济发展能否有序推进,还涉及到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能否协调发展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平等的分工才是正义的,而平等的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剥削的消除。实践证明,我们建立在生产力极其落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所有制形式,这在客观上要求实现平等分工还必须从制度层面做出技术性规定。比如通过相对公平的考任制度,加速社会流动,在公平竞争中实现社会分工的平等性;削弱特权在长期权力和权利分配中的制度以及政治习惯中的固化作用,因为分工体系内的特权必然导致不平等的分工体系和分工结果,这就要求在制度层面上清除作为特权的权力和权利;确立多元化的价值理念,保障分工群体的利益和尊严,从物质上和社会声誉上维护“底线公平”。因此,对我国现有分工体系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分工制度进行大力改革十分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①只有对分工领域中的不合理制度顽疾进行大力改革,减少因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不平等收入,才能有效缩小收入差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距,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自愿、平等分工。

第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国分工理论的研究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启示我们,对分工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效率和科学理性的层面,还要关注社会分工的价值层面。既不能因为当前分工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全面否定以分工理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也不能试图照搬和复制西方经济学来解决。我国分工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具有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中国特殊性特征,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重视的是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理论体系不能简单地排斥。在分工领域,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分工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主流经济学,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来推进我们国家每一个阶段的重大经济决策,而不是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来解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建设服务。”^①研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聚焦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如何让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惠及全体百姓,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如何使用好分配、分工杠杆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可以说关注经济良性有序发展,实现社会分工的公平公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生产领域和社会领域内的新式分工必将代替旧式分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共同富裕,共享发展。分工领域内存在的阶段性和制度性问题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和解决。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应有的时代担当。

(责任编辑:王永贵)

Marxist Labor Division Theory: Its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YIN Cai-xiang

Abstract: When formulating their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and Engels set up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theory of labor division. This theory of labor division not only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labor division scientifically but also reveals its nature thoroughly. According to Marx and Engels, labor divis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features: historical inheritance, inherent inequality, geographic imbalan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All this constitutes the gis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labor division. This theory not only helps us develop du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y of and cause for the inequality in the labor division promoted by globalization, but provides us with better vision when analyzing, understanding and tackling the series of problems posed by the labor divis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mplemented by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Marxism; labor division theory; society equality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